

目 錄

- 馬鴻逵对阿拉善旗的残酷压榨……………达理扎雅 (1)
- “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紀要……………何兆麟 (7)
- 德穆楚克栋魯普和蔣介石之关系……………陈紹武 (32)
- 达烏里站泛蒙古独立运动……………博彥滿都 (63)
- 札薩克图旗和鎮国公旗的叛乱……………博尔古德 (70)
- 烏泰王叛乱事件……………博彥滿都 (92)
- 附件一 烏泰王发布东蒙古独立宣言及札魯
 特左旗对烏泰的援助……………邢复礼譯 (101)
- 附件二 烏泰王向俄国借款始末……………邢复礼譯 (105)
- 貢桑諾尔布……………吳恩和、邢复礼 (113)
- 納森达賴在准格尔旗……………政协准格尔旗委员会 (132)
- 綏远省乡村建設委员会与乡村工作指导員……………刘映元 (142)
- 我对綏远革新运动与和平起义的回忆……………卢健飞 (234)
- 包头的复字号……………高瑞新、刘靜山 (264)

馬鴻逵对阿拉善旗的殘酷压榨

达理扎雅

阿拉善旗因地处边远，自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初年）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还没有直接侵入；政治上沿袭着滿清和北洋軍閥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制度；經濟上除定远营（巴彥浩特）有少数中小商号、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四壩（阿旗东部地区）有部分农业外，純属游牧經濟。由于地区辽阔，交通梗塞，与外界往来很少，几乎处于閉关自守状态，这种局面到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馬鴻逵反动統治相繼侵入以后，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生活愈趋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一九三一年馬鴻逵統治宁夏以后，不断采取高压的統治手段，进行其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对阿拉善旗的統治。軍事方面：在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一九三七年秋季，国民党国防部派郑子献为阿旗軍事专員，随之馬鴻逵以防守阿旗为名，派馬鴻宾部三十五师张海祿步兵团也驻扎到阿旗定远营，昼夜举行軍事演习，修筑工事，实行軍事控制。郑子

献一面在定远营明目张胆地进行特务活动，勾结暗娼李存存并拉拢地痞流氓，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隔阂，扰乱社会秩序。另一面与馬鴻逵訂立攻守同盟，暗中进行顛复旗政权的活動，企图迫使阿旗人民俯首接受蔣馬匪帮的統治，以便实行其大汉族主义政策和封建軍閥統治。这些行为和阴谋，激起了阿旗人民的反抗，在人民群众的促使下，阿旗旧政权不得不作了一些抗拒准备，将旗政府库存枪枝弹药、档案和部分財物轉移川牧区，以便一旦有事能与馬鴻逵进行战斗。当双方戒备森严之际，馬鴻逵詭計多端，提出和平談判解决双方誤解的建議，并派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員刘柏石緩和局勢。但一九三八年春旧历正月二十五日，馬鴻逵却以換防名义調集大批步騎炮兵配合飞机一架向阿旗定远营突然发动武装进攻。参加进攻的部队除原駐定远营的张得祿团外，又調来宁夏省警备第一旅馬宝琳部王有祿步兵团和何玉魁步兵团，配合一个騎兵营和一个炮兵营，并派馬騰蛟为总指揮，分两路进攻。定远营在大軍重重包围下，守城的一連阿旗保安队和行政人員以及蒙汉居民激于义憤，奋起抵抗，激战一昼夜，定远营未被攻入。但以众寡悬殊无力繼續抵抗，阿旗政府不得已派員与匪軍总指揮馬騰蛟进行和談。当时馬鴻逵提出兩項要求，一是将定远营阿旗保安队全部解除武装，二是将札薩克达理扎雅移住銀川，否則繼續炮轟定远营。馬鴻逵在围攻定远营的同时，由銀川派騎兵两个团，天德阿旗保安队第八中队的駐守地——亭子（在三盛公附

近)，队长楊富存（現任巴盟軍分区副司令員）奋勇抵抗，虽未被攻入，然因众寡悬殊，楊富存队长不得不率部撤退到阿拉善旗的北山一带。由此也足以証明馬鴻逵的围攻定远营是他蓄意已久的阴谋活动。阿旗政府当强敌压境，兵临城下，对此无理要求，不接受也得接受。正月三十日馬鴻逵将阿旗札薩克达理扎雅押往銀川，軟禁了八年之久。于是阿旗的定远营就变成了馬鴻逵的軍营，霸占民房，强拉民夫，强买强卖，全旗各族人民完全陷入馬鴻逵血腥統治之中。

政治方面：紧接着軍事进攻之后，馬鴻逵即阴谋在定远营設置县治，并欺騙蒙古人民說：蒙古人民仍归蒙旗政府管轄，定远营的汉人由县管轄，企图第一步先形成一个旗县并存的局面。但由于蒙汉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未得逞。以后馬鴻逵又以办事处名义，于同年秋天在定远营設立了伪“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并派其心腹爪牙张朝栋、高中第等为主任，名为办事处，实际上就是变名的县治。办事处下設立各科，首先在定远营清查戶口，編制保甲，填发身份証，登記壮丁，并对商号及各行业摊派苛捐杂稅，进行横征暴斂。当时定远营有居民二千余戶，人口七千余人，共編了八个保，一百二十个甲，后又改編为十三个保。并設立各保联合办公处，派首席保长数人在伪办事处的指使下对人民直接地进行压榨剝削和征兵工作。馬鴻逵的征兵給阿旗人民，特别是定远营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和痛苦。从一九四〇年秋季开始，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先后共征兵七次，每

次征兵八十名至一百余名不等；同时还经常征补逃兵，每次抓兵都秘密进行，先以军队突然将街道四面严密封锁，再派保甲长挨户搜捕，闹得居民提心吊胆，鸡犬不宁。不幸被抓去者，父母妻子不忍分离，拉拉扯扯，痛哭流涕，见者无不心酸。经过几次征兵后，大部分青壮年都被征走，没有被征去的也不能安心生产，只好抛下父母妻子逃往他乡，流落在外；被征者，由于不堪虐待，遇有机会即行逃跑。因此马鸿逵军队中经常有大批逃兵，这使马鸿逵非常头痛，于是规定了最惨酷的惩办逃兵办法：跑一个向原地罚三个，并把家属抓去关押吊打；而逃兵本人如被追回，轻者非刑拷打，重者立即枪毙。另外对商号店员和手工业作坊的学徒也进行征兵，商号和手工业作坊主无法向其家属交代，只好出钱雇人顶替，而卖身当兵的人，大都是地痞流氓或兵痞，得钱后，一入兵营又趁机逃跑，马鸿逵再向原主要兵，如不补雇就被抓去监禁。雇了再雇，反复压榨，使各商号和小手工业者的补兵年年月月也没有交清的日子，最后只有破产倒闭的一条路。到无兵可抓时，马鸿逵又实行以马代丁或以骆驼代丁的办法，向人民进行敲榨勒索，规定“以五匹马和七只骆驼代替一个兵”，以后减少到马两匹、骆驼四只，但骆驼需鞍具俱全；款项由保办公处同商会、农会，按营业大小向各商号及手工业作坊、农民和市居民摊派，这样先后征去骆驼约达一千余只，马八百余匹。另外强迫旗政府以购买名义，向牧区征走马匹达两千余匹，牛五百余头。

經濟方面：馬鴻逵為迫使阿旗人民屈服，首先在阿旗實行了封鎖糧食的政策，派其爪牙宋清珍、雷震霆等人在定遠營設立“軍警聯合督查处”，在沿邊界地區還有大批騎兵緝私隊巡邏，嚴格禁止任何人運糧食進入阿旗；並在交通要道設置兵卡暗探，如有把糧食運入阿旗者，一經查獲，糧食、牲畜、車輛立即充公，並將人押入軍警聯合督查处，拷打監禁或者加倍罰款，因此造成阿旗糧食奇缺，糧價一日几漲的恐慌局面，廣大人民終年不得一飽。

在經濟掠奪方面，又派其忠實爪牙邢椿年，在定遠營設立偽“寧夏省銀行駐定遠營辦事處”（以後改為富寧公司），以其雄厚的官僚資本及軍閥勢力，壟斷控制全旗的皮毛及其他土特產。壟斷方法，是以貸款賒欠欺騙等卑鄙手段進行的，即在每年冬春季節農牧民生產和生活有困難的時候和在各中小商號周轉不靈的情況下，以月息八分向農牧民及商號放出大批貸款，到夏秋皮毛上市時以官價駝毛每斤二角四分、羊毛每斤八、九分收回皮毛。在這樣殘酷的經濟剝削下，農牧民群眾終年辛勤勞動的成果和小商販一年經營的贏利，全部交給偽省銀行辦事處還不夠償還貸款及利息，而只得再向其貸款。這樣年復一年的在貸款利息和官價強購嚴重剝削下，廣大農牧民的貸款永遠也償還不清。而牧區人民唯一賴以生存的牲畜皮毛便完全掌握在偽省銀行辦事處的手中了。同時對於賀蘭山的木材富源，馬鴻逵亦設立有木料廠加以控制，一到采伐季節，匪軍即成連成排地入山亂砍亂伐，使大片森

体遭到严重的破坏。

由于在馬鴻逵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年的残酷統治下，抓兵、派款、要馬、要駝，橫征暴斂，长期压榨剝削，全旗的农牧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定远营原有的一百五十余戶中小商号及小手工业作坊，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期，仅剩下十余戶，大批的青壮年劳力逃亡在外，人口由原来的七千余人，到解放前仅剩下三千余人，市面萧条，造成乡村无人烟，集鎮无青壮的悲惨景况。直到一九四九年秋，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阿旗才得到和平解放，从此結束了蔣馬匪帮在阿旗的反动統治，开始了新生。

“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紀要

何兆麟

“西蒙自治运动”是指德穆楚克栋魯普（以下简称德王）等于一九四九年在阿拉善旗搞的所謂“蒙古自治运动”而言，“西蒙自治政府”这个名称，是在后来临近解放，德王出走的时候才更换的，起初的名称叫“蒙古自治政府”。

（本文仍采用“西蒙自治运动”这个名称）現在仅就个人記憶所及，写出这段史实。不过事件的发生仅仅是曇花一現，很快地就垮台了，所以記憶不深，可能有不尽翔实、不尽完整的地方，特别是時間日期，希望熟悉情况的人，予以补充和修正。

一、德王等到阿拉善旗的經過

德王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伪蒙疆政府潰灭后，曾于一九四五年冬到重庆見過蔣介石一次。尔后，即寄居北平，直到北平临近解放的时候，即一九四九年元月一日那天，国民党“华北剿总总部”，据說是根据国民党国防部电令，突然派令蒙藏委员会駐北平办事处处长何兆

麟专机护送德王到南京。德王到南京后，曾见过蒋介石和李宗仁，当时，微闻国民党政府准备送德王到西康去住，而德王不愿意，后来他自己选定去青海西宁。国民党政府遂于同年元月二十五日派专机送德王去兰州轉西宁。路过汉口、西安时，白崇禧和胡宗南均曾分别款待。在西安因飞机发生故障，停留两三天，于元月底才到了兰州。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准备去南京充任国民党和谈代表即将离兰之际，张治中也曾款待过他。德王滞留兰州约两个月左右，并未去西宁。后来忽然致信阿拉善旗札薩克达理扎雅，表示想到阿拉善旗去住，經达复信同意后，德王便于同年四月初来到了阿拉善旗。

这时，北平早已解放，人民解放军正在进军西北，住在兰州的白海凤为躲避当地将来炮火的危险，在同年三月初携眷来到阿拉善旗。住在宁夏的巴文峻也随之而来。何兆麟则送德王到南京后准备绕道兰州、宁夏、綏远回北平（当时从南京去北平的飞机不載旅客），乃搭乘送德王去兰州的便机一道到达兰州后，便于同年二月六日由兰州順路到了阿拉善旗。正在何兆麟、白海凤、巴文峻三人先后到阿拉善旗的这个时候，德王也来到了这里。

二、“自治問題”的提出和“自治政府”的筹备

德王来到阿拉善旗不久，便向达理扎雅、白海凤、何兆

麟、巴文峻提出蒙古自治問題。他說：“蒙古人一向要求自治，總沒有實現，現在國民黨自顧不暇，沒有力量來管這些事，我們不管它答應不答應，應該乘機進行，現在是最好的機會，不應該錯過。”當時大家認為時局已經如此緊張，怎麼能夠進行這種事呢？就是勉強為之，也怕徒勞無益，表示仔細考慮而後再說。德王接着連續幾次提出來商量，大家總不免有些顧慮，怕解放以後給自己添出許多麻煩。隨後，白海風乃密對達理扎雅、何兆麟、巴文峻三人說：“現在時局已經很緊，形勢是已經定了，蒙古自治這件事，在國民黨領導下，是不應該再辦，但是如果要辦的話，也有一點好處，那就是能夠把從東北跑過來的這些蒙古武裝軍政人員，設法收容起來，不至東奔西逃，到處為害，就是將來解放了，也對解放有一定的好處。另一方面，如果一時解放不了，這部分軍政人員，也是一部分力量，還可以借此搞搞地方工作。”

達、何、巴三個人聽了這番話之後，覺得也有些道理，認為如果將來解放不了，對國民黨來說，是自治而不是什麼背叛；如果將來解放了，對共產黨來說，給人民解放軍在軍事上堵截住叛匪，消除了內蒙西部地區的戰爭危害，是為迎接解放，而不是抗拒解放，這是一舉兩得之事。這種政治投機的反動思想，和德王封建統治的反動思想，到此恰好合上拍了。於是又經過了幾次商談，大家便一致同意成立政府，實行自治。不久，德王舊部扎奇斯欽、德古來、烏古廷、吳熙憲等，都先後從台灣來到了阿拉善旗，蓋德王先期就早已通

知他們的。

随后，紧接着就商量自治政府的名称问题。德王主张蒙古统一的名称，提出定名为“蒙古自治政府”。而白海凤、达理扎雅、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则主张采用“西蒙自治政府”的名称，认为东部既有王爷庙的自治联合会，就应当避免在自治区域问题上的重复对立，所以只能限于没有解放的地区，不应当把东部蒙旗包括在内，这样，将来就是解放了，对共产党也比较好说一些；如果完全无视王爷庙的自治运动，对自己那将是很不利的。可是德王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同意西蒙自治政府的名称，认为蒙古是统一的，绝不能分割成为东西，如果分割开来，有失蒙古人心，于自治前途诸多不利，故必须定名为蒙古自治政府。双方各执一见，争吵多次。其实，这两种意见，还不是“半斤八两”，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可能后者更加阴谋奸诈，罪加一等，又有什么“对共产党好说一些”的理由呢。最后由于德王、扎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等人的坚决主张，终于采用了“蒙古自治政府”的名称。但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两种意见，仍在争吵；可是依然没有改变了原来已定的这个名称。

在自治的管辖区域问题上，德王等根据决定采用的“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名称，主张全部内蒙地区都应当包括在内。而白海凤、达理扎雅、何兆麟、巴文峻等，则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实际上不但作不到，而且白白地给自己惹麻烦，

因此，主张自治区域只能限于没有解放的烏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綏东四旗、土默特旗、阿拉善旗、額济納旗。至于出席成立自治政府代表大会的代表，则不限于这些盟旗，东部盟旗目前旅居阿拉善旗的人士，也可以推选代表参加大会。德王等鉴于事实上的确也管轄不到东部盟旗地区，最后就放棄了自己的意見，但又主张加入青海、新疆的盟旗，大家也就同意了。

大家同意实行自治以后，就成立了“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公推伊克昭盟杭錦旗札薩克阿拉坦瓦奇尔为主任，德王、达理扎雅为副主任，何兆麟为秘书长，扎奇斯欽为副秘书长，白海凤、巴文峻、何兆麟、扎奇斯欽、林沁僧格、阿拉坦瓦奇尔、德古来、德王、达理扎雅、达密林旺楚克、烏古廷等为委員。但阿拉坦瓦奇尔始終未到，不久也就病故，又改推德王为主任。

筹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項：1. 草拟請国民党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批准实行蒙古自治的电文。2. 拟定各旗出席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額。3. 草拟蒙古自治政府的組織法。4. 草拟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宣言。

（一）关于請求准予蒙古实行自治的电文的大意說：蒙旗自治原为蒙古人的多年愿望，乃因长期內忧外患，迄未实现，而今由于勘乱軍事的一时失利，东蒙各旗相繼失陷，蒙旗人心惶惑，动荡不安，而中央軍务倥傯，无暇全力顧及蒙旗，爰为全国上下共赴国事，拟請中央高瞻远矚，俯順輿情，

准予蒙古实行自治，俾便团结各旗，巩固地方，用维秩序，安定人心。倘能假以事权，必能裨补戎机，不仅乐利于蒙民，抑且有助于前方，庶分中枢宵旰之劳，解中央北顾之忧。临电迫切，惟乞迅电示遵！

(二) 关于各旗出席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问题，当时因为时间仓卒，交通不便，没有时间进行调查，按人口比例作具体的规定，只是大体上按照各旗的人口粗略估计，规定人口较多的旗可推派代表三至四人，人口较少的旗可推派代表一至二人。至于旅居阿拉善旗的一些东蒙的人，留在代表大会开会之前，临时决定由东北叛变出来的国民党新编第一旅部队中推选产生。

(三) 关于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的主要内容是：1. 蒙古自治政府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2. 主席、副主席下，设政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领导机关，由政务员十一人组成，会议时以政府主席为当然主席，主席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下设秘书厅，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一人；内务署设正副署长各一人；财政署设正副署长各一人；教育署设正副署长各一人；实业署设正副署长各一人；保安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正副参谋长各一人。3. 蒙古自治政府设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议员若干人。并规定议会议长、副议长暂由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参议则暂由蒙古自治政府就所属各旗人士中聘任之。

(四) 关于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实行自治宣言的大意說：人类自由平等乃天赋之权利，全世界弱小民族，現均已走向民族自治自决的道路，为全人类的自由幸福，开辟了无限光明的前途。我国孙中山先生所制訂的建国大綱以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揭櫫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均有自治自决之权利，为我国弱小民族之发展进步，指出了明确之方向。蒙古民族有土地有人民，并有本民族的語言文字，理应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昭示下，实行管理本民族之事务。而且蒙古民族在历史上也曾經成立过国家，对我国对世界都有过极大的贡献，文治武功，史不絕书。而今蒙古民族，經濟不振，文化落后，医药不兴，人口下降，日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大有岌岌可危之势，若不急起直追，前途实难言喻。爰据众意，博采群情，于某年某月某日，召开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討論通过一致决議，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期群策群力，挽民族于危亡，愿同舟共济，俾民族之复兴，尙望国内外賢达之士，予以协力匡助，俾蒙古民族复兴之大业，得以順利完成。凡贊助吾人事业之成功者，当竭誠以欢迎，凡反对吾人事业之前进者，当与世人共棄之。

在以上电文和宣言內容問題上，当时曾經有过不同的两种意見，反复激烈爭論。德王、扎奇斯欽、德古来等人的意見是：在电文和宣言里面必須提出反苏反共的明确主张和立場，才能喚起国民党和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否則是空疏无力的。而白海风、达理扎雅、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則坚决

反对，認為时局紧急，大势已定，如再标示反苏反共，一旦解放，則将如何以对共产党？絕不能作茧自縛，自找苦吃，故必須留有余地，靜待时局的自然演变。这种意見，当然是脚踏两只船，投机取巧的两面作法，自然为德王、扎奇斯欽、德古来等所不同意。但白海凤、达理扎雅、何兆麟、巴文峻等始終坚持己見不变，双方爭持多日，最后德王等鉴于相持不下，于事无补，終于放棄了自己的意見。

三、德王等广州之行

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向国民党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发出要求实行蒙古自治的电报以后，国民党中央迄无批复，为爭取時間，早日实行自治活动，德王决定亲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面請交涉。于是德王偕同林沁僧格于同年五月中旬，由阿拉善旗取道兰州飞赴广州。是时，国民党行政院长是閻錫山，副院长是朱家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是关吉玉。德王等首先向关吉玉陈述来意，而关吉玉不作直接答复，但謂可直接請示行政院。随之，德王等就会见了閻錫山、朱家驊，面述来意后，据说閻錫山答复的大意是：目前軍事上失利，是一时的現象，大局不久就可轉危为安，失陷的地区，都要很快的收复回来，国家的統一，不許任何人破坏。蒙古人一向深明大义，要在中央领导下，捍卫国家統一 帮助戡乱軍事順利进行，等到軍事胜利以后，才能談地方建設問題。并說在这时候你們为什么要請求自治呢？这不是給中央增加困难

嗎？不應該这样做，这样做对国家、对蒙古人都沒有好处。据說德王又接着解释說：实行蒙旗自治，正是为了分担中央的忧劳，免得中枢操心蒙旗的事务，这样办，便于中央专心致力于戡乱軍事，所以蒙古人才决定要求自治，这对国家有益处，还是請中央俯順輿情，准予照办。据說閻錫山便很气愤地斥責說：这时候絕對不允許你們这样办，如果不服从命令的話，中央一定实行軍事討伐。于是德王等使默然而出。随后，朱家驊又召見德王，他說：你們为了安定蒙旗人心，加强地方治安，想实行自治，也是一片苦心，这事只要不违背国家法令，有利于軍事戡乱工作，我想也不妨試办看看。我叫財政部和国防部先撥給你們一点經費和武器，你們可早些回去吧。德王等就趁此台阶带着朱家驊的这种口头指示，并領取了一万元現洋和二百支步枪、五十支加拿大手枪，（德王亲自帶回八十支步枪，其余一百二十支步枪和五十支加拿大手枪，据說由赵福海在后起运，迨运抵重庆时，便赶上解放）于同年六月底回抵阿拉善旗。这是不是說閻錫山改变了对蒙古自治的原来的态度而叫朱家驊这样轉圓的呢？不是的。閻錫山並沒有改变他的态度，而是由于国民党中央監察委员会蒙籍常务委員李永新从旁請托朱家驊給設法支持这件事情，說是蒙古自治是有利于中央軍事戡乱运动。所以朱家驊觉得扔掉一万元錢和几百支枪，既可以买个人情，又可以买个戡乱工具，沒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国民党的这一万元錢和二百五十支枪，数目虽說微不足道，但枪口是对着革

命的蒙古人民而来的。

四、国民党軍新編騎兵第一旅从东北译变 西窜陕坝和李守信从台湾而来

国民党軍新編騎兵第一旅共三个团約三千人，均蒙古人，原属李守信旧部，旅长系关邦杰，第一团团长苏和巴特尔；副团长孙明海，一九四八年秋，沈阳解放前駐防辽阳一带。嗣于国民党軍增援錦州战役中，該旅行至新民县时，在苏和巴特尔策动下译变西窜，迨窜抵察哈尔宝昌县，即由原綏远軍收編，番号仍定为新編騎兵第一旅，共轄三个团，改任苏和巴特尔为旅长，孙明海为副旅长，宝貴廷为参謀长。不久，因张家口形势吃紧，該旅又复西窜，迨窜抵武川县时，聞知德王正在阿拉善旗进行蒙古自治运动，于是又叛离原綏远軍于一九四九年初夏繼續逃窜到后套陕坝一带，随后，又进驻到布隆淖尔，便派人到德王处联系收編事宜。及知德王对經費給养都有問題，一时不易解决，乃又轉向宁夏馬鴻逵要求帮助解决。正在这时，李守信从台湾而来，到阿拉善旗出席了蒙古自治代表大会之后，便匆匆去到宁夏向馬鴻逵商請收編該旅事宜。李守信和馬鴻逵协商結果：（1）馬应許成立陝甘宁边区騎兵总司令部，任李守信为总司令，宝貴廷为总参謀长，都固仍仓为副总参謀长，該旅部队改編为騎兵第一师，归其指揮，师长为苏和巴特尔，副师长为孙明海，参謀长为赵殿臣。并允逐步扩編为三个师，成立一个騎